

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中外文化 (再版)

陈国恩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内容提要

本书从开阔的历史视野中探究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中外文化关系的诸多问题，论域涵盖异域文化和民族传统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双重影响，中国现代社会转型与文学流变、文学思潮与作家创作等关系。

书 名：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中外文化

作 者：陈国恩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

ISBN：7-5354-2829-0/I206.6

定 价：22.00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从开阔的历史视野中探究 20 世纪中国文学与中外文化关系的诸多重要问题，论域涵盖异域文化和民族传统对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双重影响，中国现代社会转型与文学流变、文学思潮与作家创作、宗教意识与艺术精神等关系。

作者以广博的专业知识、敏锐的艺术感悟力、扎实的理论素养，对一系列问题做出了系统、生动、精当的回答，学理深邃，文采斐然，读者可以从中分享到许多艺术美感和思想启迪。

一部极具较高艺术品位的理论著述；一部颇具鲜明时代特色的实用教材。可作为文科类师生教学阅读参考书籍。

五四文学的品格（代序）

五四文学是时代的产儿，但其开放的精神和自主的意识又是超越时代的。

五四文学广泛地吸取异域营养，如鲁迅和人生派作家主要借鉴俄国及东欧弱小民族的文学，浪漫派更多地取法于英、法、德等西欧文学以及日本文学，许地山小说和冰心的作品里有印度文学的影响。某一作家或某一流派向外借鉴大多有具体的方向，彼此合起来就显示了五四文学全方位开放的大气度。

新旧过渡的时代，允许人们充分发展个性，进行不同的艺术探索。因此，五四作家的创作方法也具有开放性的特点。鲁迅以现实主义方法为主，兼容了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等手法。郁达夫是浪漫主义作家，可他的小说有写实的成分和新浪漫主义的因素。这种兼容并蓄的态度，适应了五四时代表现复杂情绪的需要，也造成了五四文学博大深邃的品格。

新文学的先驱在吸收维新派文学改良运动的成果时，从新的时代感出发扬弃其中陈旧的因素，赋予其白话文形式和文学自身的独立价值，再与反封建的内容相结合，创造了文学观念、叙事方法、结构形式、风格特点都迥异于中国古代文学的

新文学。人们一度批评五四新文学过多地否定了民族传统，甚至指责它存在全盘西化的倾向，但不容置疑的是，五四文学的生气正是与这种片面性联系在一起的。历史的运动经常以包含创新精神的片面性突破旧体系的平衡，从而为建立新的秩序扫清道路。在五四这样革故鼎新的历史关头，情形尤其如此。

五四作家在激烈地反抗传统时，其内在的人格和潜意识仍受到民族传统文化的制约。像人们早已注意到的诸如郁达夫的《沉沦》等作品不经意地流露出来的男女大防之类的传统意识，固然是民族传统文化仍然具有影响力的一个证据，而更具普遍意义的是，民族传统文化对新文学的影响表现为一种独特的形式：它启发五四作家以自己对传统文化的局限性所达到的认识深度向西方寻求与之相反的思想武器。传统文化和旧文学以其封建、保守、僵化的性质从相反的方向上规定了新文学对外来文学思潮的取舍。五四时期西方各种文学思潮中唯独古典主义没有传入中国，原因就在于西方古典主义文学是新生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相互妥协的产物。它用理性规范情感，与中国重理抑情的文学传统相近，不利于五四时期对传统文化的批判。

任何一种外来的影响所起的作用，其实只是激活了影响接受者自身发展的一种潜在可能性，对各种外来影响起最终决定作用的还是本土的现实需要。五四是一个思想启蒙的时代，以生动的形象激发读者理性思考的写实文学显示了它的优势，因而包含人道主义精神的西方现实主义文学思潮进入中国后，很快成为启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五四文坛上掀起了“为人生”的文学主潮。浪漫主义文学因其表现个人的主观，张扬个性，更依赖于读者的理解和支持，因而它须等到启蒙运动造就一大批获得了新的价值观念和审美意识的读者后才能在五四文坛上产生广泛的影响。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很长一个时期里与

一般读者的审美习惯有很大距离，显得曲高和寡，因而它在大半个世纪里始终是在相对狭小的圈子里生长，并且要不断地从民族传统和现实发展中取得精神资源，以展现自己的影响力。

五四文学从现实需求出发借鉴西方文学，把外来的经验化为自身的血肉，开创了建设中国现代文学民族风格的新纪元。由于新文学先驱者的创造性劳动，原本相互对立的中西文学传统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了对接，在中国文学传统实现了现代转型的同时，外来的文学思潮也通过现实需求这张网络的过滤获得了中国化的特性。

正是在这种以现实需求规约外来影响的机制里，包含着五四文学最为可贵的自主意识。在一个遭受西方列强侵略的国度里，要克服民族屈辱感向西方学习，这需要清醒的自觉和健全的心态。五四先驱放出眼光向外大胆拿来西方文明，对内不再迷信传统的权威，不再“代圣贤立言”，全凭个人的信仰、学识和情感独立地对生活下判断，自主地表达内心的追求，表现出高度的主体性。

五四文学虽然也内含苦闷和彷徨的情绪，但那是觉醒了的人的苦闷和彷徨，其悲凉的情调佐证着人的精神没有死去。不仅如此，五四文学的精神追求超越了具体的目标，只表现为一种善的愿望和对美好前景的向往，其理想是没有终点的。而当理想一旦具体化，变成某一个可以实现的蓝图时，往往就蜕变成为一种消极因素，催生出一个粉饰升平的文学时代。

五四文学是一座高峰。它所展示的姿态、表现出的气魄和提出来的问题影响深远。以它为尺度来反思整个 20 世纪文学之旅中的曲折和艰难，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其实是为了圆一个新的文学之梦！

目 录

五四文学的品格（代序）	1
第一章 异域文化的光照	1
第一节 《堂·吉珂德》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	1
第二节 “拉普”与中国左翼文学批评	15
第三节 现代派文学背景中的浪漫主义思潮	31
第四节 屠格涅夫与郁达夫小说	44
第五节 周作人与“江户情趣”	57
第二章 民族传统的承传	76
第一节 阳明心学与梁启超的文学改良观	77
第二节 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浪漫主义思潮	93
第三节 新月派诗与婉约派词	106
第三章 社会转型与文学流变	118
第一节 稿费制与清末民初文学变革	119
第二节 现代浙江作家群的崛起	132
第三节 抗战时期新浪漫派小说的流行	145
第四节 “自由”派文学的兴衰	155
第五节 20 世纪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流变	174
第四章 宗教的关怀	211
第一节 浪漫主义文学与宗教	212
第二节 废名小说与禅佛艺术精神	223
第三节 沈从文湘西小说与道家艺术精神	234

第四节	张承志的文学与宗教	250
第五章	文学思潮与作家创作	271
第一节	五四传统与周作人的思想蜕变	271
第二节	文学思潮变迁与闻一多的新诗	286
第三节	30 年代 “ 最后一个浪漫派 ” 沈从文	298
第四节	萧红小说与五四文学传统	314
第五节	池莉的世俗认同与身分焦虑	324
后 记		337

第一章 异域文化的光照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是与外来文学的影响密切相关的。这种影响来自多个方面，从西欧、东欧、日本、印度到阿拉伯，乃至后来的拉美文学，其规模和深度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而且这一过程还在持续之中。外来影响的一个积极成果，是使中国文学实现了现代的转型，具备了现代的精神品质和审美特点。系统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外国文化思潮的关系，是一个庞大的工程，这里做的仅是选择几个点，从一些侧面考察这一影响过程的特点和意义，揭示中国文学面对外来影响时所作出的回应。

第一节 《堂·吉珂德》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

为数不多的世界文学名著，像灿烂的精神之灯，照亮了人类文化发展之路。一个民族对这些文学巨著的接受，既是受其

恩泽，又是自身文化底蕴、精神品质、创造能力的显示。因此，研究一个民族对世界文学巨著的接受史，既是比较文学的课题，也是探寻民族精神成长史的重要途径。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称得上是这样一部光芒四射的巨著，20世纪中国对这部小说的接受则折射出了中华民族在此期间所经历的历史和现实的挑战，以及中华儿女所作出的悲壮回应。在新世纪曙光降临之际，理清这一接受史，发掘在此过程中积累起来的文化资源，对于中华民族自信地面向未来，会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

堂·吉珂德最早来到中国，是在20世纪初。大约1908年，鲁迅与周作人在日本读到了《堂·吉珂德》的德文本。十多年以后，周作人在回忆当时情形时仍十分动情，说《吉珂德先生》是他很喜欢的书，甚至比《水浒传》还要亲近。鲁迅一直珍藏着这一译本，后来又陆续搜集了日本版的精装本，法国著名画家陀莱的插图本《机敏高贵的曼却人堂·吉珂德生平事迹画集》（共120幅，1925年德国慕尼黑约瑟夫·米勒出版社出版）。鲁迅还收藏了塞万提斯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埃斯特拉马杜拉的嫉妒的卡里扎莱斯》，可见他对这一世界文学巨匠也非常重视。

最早对《堂·吉珂德》作出科学评价的，是周作人出版于1918年的《欧洲文学史》。这是周作人在北京大学上课时的讲

周作人：《塞文狄斯》，《自己的园地》，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167页。

娅青：《对西班牙文学的思考》，《鲁迅藏书研究》，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251页。

稿，他在书中写道：“cervantest（塞万提斯）以此书为刺，即示人以旧思想之难行于新时代也，唯其成果之大，乃出意外，凡一时之讽刺，至今或失色泽，而人生永久之问题，并寄于此，故其书亦永久如新，不以时地变其价值。书中所记，以平庸实在之背景，演勇壮虚幻之行事。不啻示空想与实生活之抵触，亦即人间向上精进之心，与现实俗世之冲突也。Don Quixote（堂·吉诃德）后时而失败，其行事可笑。然古之英雄，先时而失败者，其精神固皆 Don Quixote（堂·吉诃德）也，此可深长思者也。”周作人指出《堂·吉诃德》的讽刺特色和人性剖析的深度，既看到堂·吉诃德行动的不切实际，又从这不切实际的行动中体味到这是“人间向上精进之心”与“现实俗世”的冲突，高度评价堂·吉诃德的“勇壮虚幻之行事”。这显然是接受了浪漫主义时代以来西方的文学批评家关于塞万提斯和《堂·吉诃德》研究的影响，同时也体现了20世纪初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立足于社会变革的需要来接受外来影响的思维逻辑。

1922年，林纾、陈家麟合作，用文言编译《堂·吉诃德》第一部，改名为《魔侠传》，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堂·吉诃德》的第一个中译本。同年9月4日，周作人在《晨报副镌》发表《魔侠传》一文，向中国读者介绍塞万提斯和《堂·吉诃德》。其中说到《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关系，他写道：“这两大名著的人物实足以包举永久的二元的人间性，为一切文化思想的本源；吉诃德代表信仰与理想，汉列忒（Hamlet）代表怀疑与分析；其一任了他的热诚，勇往直前，以就所自信之真理，虽牺牲一切而不惜；其一则凭了他的

周作人：《欧洲文学史》，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131页。

理智，批评万物，终于归到只有自己，但是对于这惟一的自己也不能深信。这两种性格虽是相反，但正因为有他们在那里互相撑拒，文化才有进步”。很明显，周作人在这篇文章里的观点，基本上是参照了屠格涅夫的《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当然周作人也有自己的发挥，如钱理群所指出的，他提出了“堂·吉诃德”的“归来”的命题。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过去后，知识分子如何调整自己的价值观，找准自己所处的历史地位，处理好与一般民众的关系，成了一个紧迫的课题。这时，周作人肯定堂·吉诃德的“回来”，注意与强调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在人性与文化健全发展中的互补性，堂·吉诃德与桑丘（民众）的关系，并且把战胜自我看作是“一切胜利中人们所欲得的（大）胜利”，其中的苍凉感是包含着周作人自己的人生体验的，也可以说是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他自己（及其同类知识分子）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扮演的历史角色的一个历史性的反省与反思”。

二

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已经接触到《堂·吉诃德》。到20年代周氏兄弟与现代评论派陈西滢进行论战时，鲁迅又多次提到塞万提斯和《堂·吉诃德》。20年代末创造社和太阳社攻击鲁迅是中国的堂·吉诃德，鲁迅发现这些人既不懂得中国社会，也没有真正理解西班牙文学中的堂·吉诃德精神，因此约请郁达

周作人：《魔侠传》，《自己的园地》，岳麓书社1987年出版，第72页。

钱理群：《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69~170页。

《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0页、286页。

夫从 1884 年出版的一个德文本把屠格涅夫的《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翻译过来，发表在 1928 年 6 月他与郁达夫合编的《奔流》创刊号上。1929 年他还曾计划在自己主编的《朝花小集》丛书里出版一部《堂·吉诃德》译本，只是后来未能如愿，可是他仍然期望着“不远的将来，中国能得到一部可看的译本”。

鲁迅与塞万提斯的关系当然不止这些。就在林纾等人出版译作《魔侠传》之前，鲁迅已经发表了《堂·吉诃德》式的小说《阿 Q 正传》。这两部世界名著在不少重要的方面具有相似的特征，这中间不能说没有某种影响关系。

鲁迅作为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的思维特点是划清理想追求与现实世界之间的界限：既不轻信“黄金世界”的预约，也不主张虚无主义，而是坚持要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一条路来。他最反对形形色色的自欺欺人，说这是“用瞒和骗”来制造精神的“逃路”，“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地满足着，即一天一天地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鲁迅关于划清理想与现实、彼岸世界与此岸世界的思想，抓住了堂·吉诃德精神的要害。堂·吉诃德精神本来包含了两个方面：既有对于理想的执著追求，又常表现为精神的迷乱，把头脑中想象的虚幻世界混同于真实的社会与人生。鲁迅在肯定前者的同时，将这一精神的消极面加以突出，视之作为一种自欺欺人的精神麻醉剂。这样的严峻批判态度，是基于

鲁迅：《奔流 编校后记》，《鲁迅全集》第 7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75 页。

鲁迅：《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第 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40 页。

他对中国病态的国民性的一种痛苦体验与深刻观察，服务于“改造国民性”的历史主题的。鲁迅确是为了撕掉一切自欺欺人的假面，断绝一切“瞒”与“骗”的精神逃路，逼使中国人“睁了眼看”，才创造了阿Q这一不朽的艺术典型的。阿Q在现实生活中遭到失败，却在虚幻想象中取得了胜利，这种主观与客观的相互分离与混同，是一种典型的堂·吉珂德式的精神迷乱。据报载的材料，早有人注意到了阿Q与堂·吉珂德在精神上的相通：“董·吉珂德和阿Q两个人的名字，很流行于中国的知识分子之间，我们常常听讽刺或骂人的话：‘你这家伙阿Q精神十足’！‘你呢！你是董·吉珂德’，这里把阿Q和董·吉珂德并列，真的，一般人都把董·吉珂德和阿Q‘无意间’并列起来”。显然，人们主要是在主观与客观相互分离与混同这一根本点上把阿Q与堂·吉珂德并列起来的，而且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仍有学者在关注他们俩的这种关系。

不过，伟大的作家创造的艺术形象除了能体现人类的共同本性外，必包含对民族精神独特性的发现。正如张梦阳所指出的，阿Q与堂·吉珂德虽是精神兄弟，却是有着深刻差别的。堂·吉珂德属于“主观冒进型”，沉浸在主观幻觉中，以百倍的勇气向想象中的敌人冲杀而去，越战越勇，从来不知道退却；

荷影：《关于“董·吉珂德”和“阿Q”——并介绍解放了的董·吉珂德》，《上海周报》第4卷第8期。

代表性的文章有：秦家琪、陆协新的《阿Q和堂·吉珂德形象的比较研究》（《文学评论》1982年第4期）；陈涌：《阿Q与文学典型问题》（《鲁迅研究》第3辑）；李春林：《欲望与想象的互相转化——从世界文学人物形象考察“精神胜利法”的世界普遍性》（《广东鲁迅研究》1992年第2期）

阿 Q 则属于“内心退缩型”，他一遇障碍，就惯于退却，自轻自贱——即使被逼到了绝路，他也不是进行反抗，而是“自己打自己”。这是因为阿 Q 的性格打上了中国传统文化消极性的烙印。换言之，阿 Q 是从消极的方面发展了堂·吉诃德的精神。这反映出，在鲁迅看来，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农民，早已习惯于自欺欺人，生活在主观幻觉中，不敢正视客观现实，甚至甘于沦为现实的奴隶。阿 Q 精神集中地体现了中国国民的这种劣根性。而西班牙的疯颠骑士则除了把想象与现实相混淆的一面外，还有积极进取的精神，追求理想的执著与为理想而献身的意志和热情。

三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小说创作受《堂·吉诃德》的影响，除了鲁迅，还有废名。与鲁迅用哈姆雷特的怀疑精神来解剖中国的堂·吉诃德、坚持一种激进的启蒙主义立场有所不同，废名是以人生真谛探寻者的姿态，用戏拟手法把堂·吉诃德的精神东方化了。

废名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以前写的小说，大多是在宁静和谐的乡村生活背景中展现老人的慈祥，孩子的天真，人们知足常乐，一派田园风光。1932 年，废名出版了长篇自叙性小说《莫须有先生传》，表现出截然不同的风格。这部小说以他 1927 年冬卜居北京西山的个人经历为素材写成，然而这又不是一部一般的自传性小说。废名在故事中加进了许多奇思异想，半真半假、亦真亦假、装疯卖傻、似颠似狂，使它成了一

张梦阳：《阿 Q 与世界文学的精神典型问题》，“纪念鲁迅诞生 110 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

部不易解读的奇书。

《莫须有先生传》受塞万提斯《堂·吉诃德》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作品里有一段，描写莫须有先生在上西山途中，脑海里忽然想起了西班牙骑士堂·吉诃德，越想越觉得自己像这位中世纪的骑士，只是马变成了驴，又少了一个“桑丘”。莫须有先生还曾十分自豪地告诉房东太太，他身上带着“两部好书，一是英吉利的莎士比亚，一是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废名自己其实也曾明确谈到塞万提斯与《堂·吉诃德》，透露了他创作《莫须有先生传》的缘起：“顶会作文章的人大概就是一个生活的能手，乘风破浪，含辱茹苦，随处可以试验他的生存的本领，他大概是一个‘游民’，逐水草而居了。……屠格涅夫说西万提斯的《吉诃德先生》是代表一个理想派，……我的意思则适得其反，他是——他是一个‘经验派’！耍了一个猴戏给我们看。”《莫须有先生传》其实就是废名用真实的材料耍给读者看的“一个猴戏”！

废名最佩服塞万提斯的，是他胸无全书却能涉笔成书。《莫须有先生传》出版多年后他还颇有心得地说：“这部书（按指《堂·吉诃德》）最有意思的地方，至少我个人觉得最有意思，乃是无全书在胸，而姑涉笔成书，其价值恐在《水浒》以上也。”塞万提斯写《堂·吉诃德》起初没有周详的计划，让老骑士出门后，并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连桑丘这么重要的一个角色，起初也不在他的心里，一直到路上听见一个店主人说岂有骑士出游而不带随从的道理，吉诃德先生才回转头来携带桑丘出门了。故事是现写现编，主仆两人的形象是随着

废名鹤西：《邮筒》，1930年5月26日《骆驼草》第3期。

废名：《无题》，《冯文炳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故事一步步清晰起来的，最终竟然超出了作者原初的创作意图。这无疑给了废名重要的启示。废名写《莫须有先生传》，也“无全书在胸”。《骆驼草》周刊正在筹办之中，需要稿件，废名便决定写它。第一章《姓名年龄籍贯》开头说：“我因为无聊，而且我们大家现在开办一个《骆驼草》，我得做文章，我想我最好是动手写我的《莫须有先生传》了。”于是，他让清瘦、古怪的莫须有先生骑上毛驴，带着赶驴的农夫上路了。后来的故事也是现写现编的，莫须有先生的性格随着故事展开，渐渐地由单薄到丰满，由模糊到清晰。

在人物塑造上，两部书也有重要的相似之处。堂·吉诃德和莫须有先生都是有正义感、有理想，路见不平愿拔刀相助的侠义之士，也都是疯疯颠颠、精神不太正常者。堂·吉诃德把风车当成巨人，莫须有先生把骆驼当成野兽。堂·吉诃德为了心中杜撰出来美女杜内西亚去行侠，莫须有先生也害着相思病，“希望一阵风吹到一个员外的花园，被绣楼上的小姐看见，然后演一出才子佳人的古典罗曼司。”堂·吉诃德常混淆主观与客观的界限，见风就是雨，莫须有先生也不时闹出笑话，如一听赶驴的农夫说有两个强人抢了农民的东西，就把满世界的人都当成强盗，连自己化钱雇来的两个驴汉也被当成强盗的同谋。堂·吉诃德常议论风生，出口成章，显示出渊博的学识和过人的见解，莫须有先生也会小题大作，看到老太太在花园的杏树林里解溲也忍不住引经据典大发议论，蹲厕所看到窗外好景色，“悠然见南山”，也要大发议论。这些都可看出废名对堂·吉诃德的戏拟。

废名戏拟堂·吉诃德的行状，所表达的却是他自己的感受。废名的好友卞之琳在20多年后回忆当年情形时写道：“《莫须有先生传》写得好象很顺手，却不是水到渠成，而湮漫无涯。